

朱德百年植树遗迹蕴含的生态文化

尹伦 杨竣

大观公园位于昆明市以西的滇池畔,始建于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建大观楼,公园也因此而得名。乾隆年间,名士孙髯翁登大观楼有感而发,傲然撰书一百八十字的《大观楼长联》,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把滇池风光和云南数千年历史风物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大观楼因长联而名,成为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的四大名楼。除了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外,大观公园也有着特色鲜明的园林景观以及丰富的城市动植物资源,特别是以古树名木为代表的各类树木,包括树龄百年以上的滇朴、侧柏和桑等,以及大片新种植的银杏、松、杨柳等树林。

古树名木、多样性植物资源与厚重的人文历史相结合,形成了大观公园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朱德百年植树遗迹及其蕴含的生态理念成为大观公园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朱德百年植树遗迹文字简介,1922年朱德于此种植此树,距今已有101年的历史,现辑录部分文字:“1922年初春,朱德等人造访大观楼,种桉树苗木以示纪念。峥嵘岁月,参天大树拔地而起。桉树已枯萎砍伐,树桩仍稳如磐石。睹桉树遗迹,缅怀朱德一生戎马倥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从留存至今的朱德百年植树遗迹,我们不仅可以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革命精神,还可以体会蕴含其中的生态文化,追溯与今天生态文明理念之间的渊源。

一方面,朱德百年植树遗迹蕴含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大观公园一直都是普通民众经常前往游览休闲的公共公园,种植这棵树时,朱德时任云南省宪兵司令兼省会警察厅长,作为当时云南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朱德带头在大观公园植树,而且植下的还是当时从国外引入的、作为园林观赏苗木的桉树,身体力行来促使人们关注和改善大观公园的生态环境。此后,经过百年的植树和园林营造,大观公园的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提升,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普惠

一百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在云南省滇池岸边亲手植下了一棵树。百年沧桑、岁月峥嵘,如今这棵树留存下一个巨大的树根,依旧盘亘在滇池岸边、大观楼旁,向无数专程到此参观和缅怀的人们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秉持的植树造林与生态保护理念,这个树根作为朱德百年植树遗迹,保存于昆明市大观公园。



尹伦 摄

的休闲娱乐之地,时至今日依旧是市民们首选的公共公园。

另一方面,朱德百年植树遗迹蕴含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922年,包括朱德在内的云南地方政府组织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战争。为保障巨大的军费支出,云南地方政府急需发挥资源优势,振兴实业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经济自立并恢复民生。于是,在注重农林、振兴实业的革命需求下,云南地方政府进一步引种桉树,希望桉树在绿化环境的同时也能成为经济林

木,从而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朱德带头倡导和选择桉树进行公开种植,藉以号召大家广泛植树,兼顾种植林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增强当时云南林业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桉树人工林在维护国家木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生态防护作用和帮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其三,朱德百年植树遗迹蕴含着“建设美丽家园全民行动”的理念。百年前,朱德带头在大观公园植树并以此号

召军民政商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植树,当时的云南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奖励和鼓励植树的法规条例。朱德积极推动植树造林的思想行动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3月5日,朱德在给周恩来的信件中建议将每年的4月4日定为植树节。在信中,朱德认为植树节的意义在于:动员群众积极开展种树活动,从“我”做起,从栽一棵小树苗做起;使植树节成为一种优化环境的“良风”,无论学校与党政军民机关都来参与。同年10月,朱德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中再次强调“要普遍发动群众造林”。朱德百年植树遗迹所留存下的历史意蕴,有助于我们感悟历史,探寻发展理念古为今用,对于今天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有着独特的历史精神价值。

如今古树仅遗存树桩,但百年植树理念犹存,其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弘扬。在朱德大观公园植树的100年之后,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昆明举行了第一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并成立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COP15第二阶段会议进一步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在祖国各地植树,这些植树地点成为了今天重要的文化遗产,蕴含着“红为底色、绿为特色”的生态文化特性。我们要传承好这一生态文化,开展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植树的树木资源和历史文化调查,深入挖掘这些植树蕴含的生态文化,及其对今天生态文明建设 and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意义。同时,在朱德百年植树遗迹的生态文化基础上,继续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文化。

(作者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白鹤滩名称的演变

朱汉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 谢雪 摄

白鹤滩,位于金沙江下游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的交界处,是金沙江众多滩涂中的一个,因“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单机容量居世界第一的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而闻名遐迩,被外界瞩目。白鹤滩水电站这部“水工巨著”,因其庞大的建设规模和一系列领先世界水平的建设技术堪称“大国重器”。那么其名白鹤滩是从何而来呢?曾经也有当地人说这里不叫白鹤滩而是白河滩。

要搞清楚这个种缘由,需要回溯历史了解当初地名的真实含义。

刊载于1992年第3期《云南文史丛刊》上的一篇由建设初期随行水电工程师蔡兴楷写的《张冲的水电站》上有这样的叙述,“我们正在巧家县境内金沙江上的白鹤滩勘测电站。白鹤滩在巧家县下游60多公里处”。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94年11月第一版《宁南县志》第三章第一节河流的条目,介绍金沙江时记为,“白鹤滩位于跑马乡色格村荒田”。用名是白鹤

滩,然而这个地名是现在水电站坝址下游2公里左右的地方。

2019年12月出版的《云南省巧家县地名志》在大寨镇的条目里有这样的记述,“最高点岩尖尖(山)海拔3229米,最低点哆车村白河滩、海拔578米”。最低点处就是白鹤滩水电站下游的最初的营房驻地处。查阅1983年12月出版的《云南省巧家县地名志》,在水电站所在地大寨镇的地名中符合电站建设位置地名的记录中也没有找到白鹤滩。历史上这里有可能被当地人称为白河滩或白河村。因为这个村民小组后面的靠山上有一股水流下,由于岩石陡峭流水飞溅谓之得名白河村,村脚下的金沙江也由于淤石堆积、河道拐弯、浪花翻卷而被叫做白河滩。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97年12月第一版《巧家县志》在1959年的大事记中是这样记录的:“6月,国家水电部、交通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组到巧家查勘金沙江白河滩,为拟建中

的水电站选址。”1966年的大事记是这样记录的:“1966年5月,交通部、水电部及云南、四川两省负责人暨专家数十人会集巧家踏勘金沙江白河滩为兴建水电站选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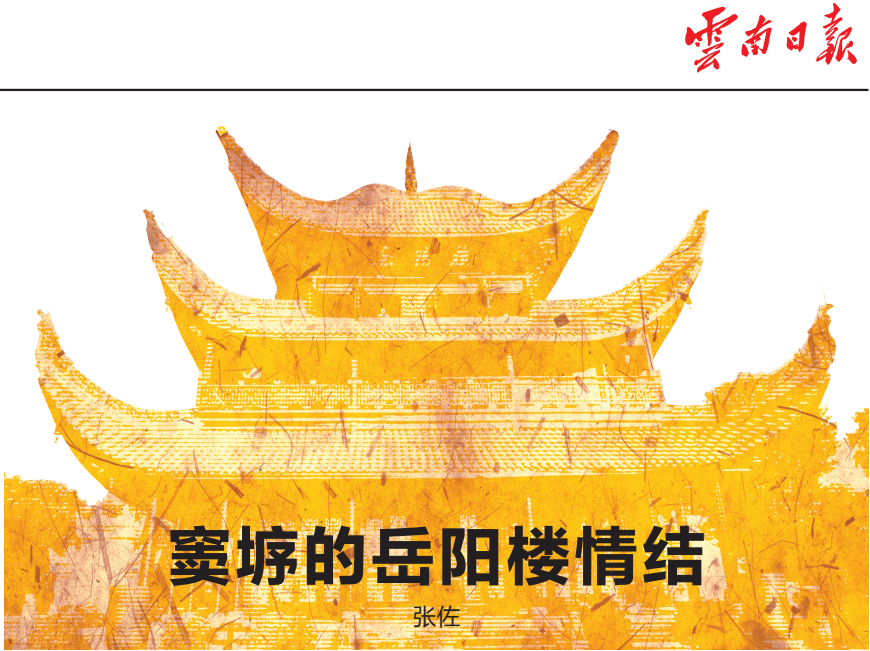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让电站所在地周边两县都引以为荣,宁南县于2003年5月率先将电站左岸所在地的六城镇更名为白鹤滩镇。位于右岸的巧家县也于2006年将原来县城所在地新华镇和紧邻的巧家营乡合并为白鹤滩镇,白鹤滩这个地名就几乎成了区域内地名的通用称呼。

巧家县的方志为什么记录为白河滩,很可能是当时勘探位置中的一个地名,而大寨镇的多车村确有白河村和白河滩这个地名,村里的流水如白练流淌,脚下的金沙江沿岸白浪翻卷,故而起名白河滩。然而,水电站的命名却似乎更有深意。雄奇山川,白鹤亮翅,作为“在建技术难度最高、单机容量最大、建设规模最大”三个“世界之最”的水电站,

白鹤滩的命名或许需要更多的环境属性和文化意蕴。

水电站所在地峡谷绝壁高耸云天,位于水电站库尾的一处江滩没有被库水淹没,现在仍然存在,滩上遍布巨石,常年江水冲刷,吸引了白鹭、灰鹭等众多水鸟在此觅食小鱼小虾。作为长江生态屏障的重要一环,承载着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重大责任,白鹤滩也被誉为“绿色引擎”。水电工程建设最大的效益之一,就是改善和重塑区域生态环境。通过开展枢纽区生态迹地恢复工作,选择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原生植物进行景观绿化和植被恢复,生态迹地恢复面积达330公顷,为野生动物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名白鹤滩,既是落实生态优先的发展思路,将水电站沿岸恢复为美丽而浪漫的地方,另一方面“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仙鸟、祥瑞之意,以鹤为名大抵也是寓意吉祥的一种方式。

(作者单位:巧家县巧家营中心学校)



窦垵的岳阳楼情结

张佐

古代的云南,交通闭塞、行路艰难。向往岳阳楼的云南人要登临岳阳楼不太容易;要想在岳阳楼题诗作对流传后世,就更不容易了。而清代的云南人窦垵却七次登临岳阳楼,并写下了至今还被人传诵的楹联和律诗,真可谓难能可贵。

窦垵(1804—1865年),字子州,号兰泉,出生于云南罗平州(今师宗县淑基村)的书香世家。祖父窦震,乃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戊子科云南乡试解元(第一名举人称解元),官至山西洪洞县知县;父亲窦欲峻,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拔贡,官至杭嘉湖道(正四品文官)。窦垵自幼深受儒学熏陶,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窦垵15岁时,由于父亲窦欲峻在湖北襄阳担任知县,曾和哥哥窦塾到襄阳就读于鹿门书院。清道光元年(1821年)春,17岁的窦垵由襄阳返回昆明参加辛巳恩科云南乡试。由于窦垵十分崇拜北宋名臣范仲淹,对岳阳楼有挥之不去的情结,途经岳阳时,便第一次登临了岳阳楼。清道光五年(1825年)春,上次乡试落第的窦垵,又从湖北随州(道光四年,窦欲峻升任随州知州)返昆明参加乙酉科云南乡试。途经岳阳时,窦垵第二次登临岳阳楼。

清道光五年(1825年),21岁的窦垵考中了乙酉科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清道光九年(1829年),25岁的窦垵又考中己丑科第三甲第五十六名进士。窦垵中进士后,签分吏部学习,分考功司行走。此后,又升迁为文选司员外郎、江西道监察御史等职。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二十四日,窦垵的父亲窦欲峻在浙江海塘杭嘉湖道任上病逝。在京城任职的窦垵于三月十五日闻此噩耗后,悲痛欲绝。次日,便与夫人登车出京奔丧。四月到达浙江海塘料理父亲后事。五月间,与兄窦塾等扶柩返云南。途经岳阳时,窦垵突然感到,父亲与范仲淹一样,都是忧国忧民的好官,父亲鞠躬尽瘁病逝于任上,范仲淹鞠躬尽瘁病逝于赴任的途中,何不代父亲上岳阳楼凭吊范文正公?于是,窦垵怀着悲痛的心情第三次登临岳阳楼。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窦垵在老家守孝期满,带着夫人启程回京城任职。夏初,窦垵到达岳阳,第四次登临岳阳楼。

以上这四次登临岳阳楼,窦垵是否触景生情写诗作对?因咸丰元年(1851年)窦垵和妻子、侄儿乘船途经洪江鸿鹄滩时,遭遇翻船事故,使他的许多文稿损失,便难以考证。然而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却在这一一次次登岳阳楼中不断被厚植。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驾崩。同年的五月,刚升任从五品江西道监察御史的窦垵向继位的咸丰皇帝上疏,奏疏的主要内容是条陈以下九事:

- 一、捐例宜永停。
- 二、经征地丁正项钱粮,不宜坐视亏短。
- 三、南漕既不能彻底清办,亦断难年年敷衍,势必终归于误,漕不可不豫筹补救也。
- 四、盐课为财政之大宗,源流不竭而日增,而国家不能以此致富,此甚不可解。
- 五、各关税课,处处赔累,年年短絀,皆藉口于生计艰难,商货不行,亦难尽信。
- 六、今日水道、江、淮、汉皆病,其害民靡费,不独河患为然,宜急筹并治。
- 七、今日之兵,以之缉捕则嫌其少,以之糜餉则嫌其多,以之征调则无一之可用,不可不熟思整顿。
- 八、京师宗室,满、蒙、汉八旗及外省驻防旗人,生齿日繁,生计维艰,人满之患,人人知其可忧,而皆委之于无可如何,恐非所以为国家万年有道之计。
- 九、今日银贵钱贱,故地丁、漕盐、满汉丁丁之受病,皆在于此,不可不权其轻重多寡而听任愈趋愈甚。

窦垵在以上九条为主要内容的奏疏中,抨击吏官救贫以解决府藏空虚的所谓良策,指出:捐例之行,污浊之风盛行,“捐班之仕途日广,科甲之仕途日隘。”可谓失计。他主张:“捐例宜永停。”并单刀直入地指出:“今日钱粮亏短之大病有三:由水旱灾荒而亏者,病在民;由包庇侵蚀而亏者,病在吏;由银贵钱贱而亏者,病在官。病在民者,蠲之可也;病在吏者,惩之可也。此皆易治之病。惟病在官者,为膏肓之疾。”

窦垵还在奏疏中主张起用林则徐、唐鉴等老臣,“请皇上召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太常寺卿唐鉴为议政大臣。二人乃成皇帝擢用贻留之人,林则徐久任封疆,熟悉中外情形,其人心细而识裕,志大而谋忠,必能措置得宜。唐鉴由翰林御史任府道藩臬,其人学有本原,酌古而能达于今,持正而能通其变,亦必不负委任。”还建议咸丰皇帝把那些在鸦片战争中欺上瞒下、卖国求荣的人

交部议治罪。

窦垵的这份疏奏,谈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说的都是重贤臣,远奸佞的至理,充满着大胆直言的勇气、忧国忧民的激情。然而,咸丰皇帝却对这份疏奏“留中不发”。窦垵心情愤懑,便于当年8月请假回云南探望继母。10月,窦垵南下路经岳阳,第五次登上岳阳楼。面对着“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洞庭湖,联想起杜甫、范仲淹、滕子京等先贤“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后来竟以失意而终的结局,窦垵悲从中来,愤然写成了如下一副世人传诵的长联: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渚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这副长联充分表达了中国文人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宏伟抱负,还将诗儒贤达的气质与山川城池的壮丽熔为一炉,既概括了岳阳楼丰富的人文景观,又展现了岳阳楼多姿的自然景观,不愧是长联中的杰作。窦垵的这副长联,后来由道光十六年进士、著名书法家、湖南道州人何绍基书写木刻后悬挂在岳阳楼主楼范记雕屏的两边。长联一挂出,就引来无数游人的赞叹和传诵。清光绪年间学者张舜铺赞叹窦垵的岳阳楼长联“大力包举,气象万千,有振衣高冈,俯视一切之概,叹为人才兴到之作,当与斯楼共存不朽。”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则将岳阳楼的杜诗、范记、孟诗、窦联、何书合称为岳阳楼的“五绝”,并称赞窦垵“诗文并擅长,佳作林立”。

窦垵第五次登临岳阳楼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回到了云南。回云南后的窦垵做了很多造福桑梓的好事。如昆明因六河很久未疏通,遇到夏秋两季常常发生水灾,窦垵“乃倡言于大府开六河,与黄矩卿(黄矩卿即昆明人黄琼)少司马及各绅士履勘兴工”。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云南爆发了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八月,咸丰皇帝下旨“在籍待郎黄琮、御史窦垵、总兵周凤歧,即著会同地方官筹办乡团,以佐兵力。”筹办乡团助官兵剿灭义军是一件出力难讨好的苦差事,此时的窦垵正在为继母守孝,本可以此为由推辞,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窦垵还是与黄琮等人迅速筹办了团练。后来他和黄琮在对义军是抚是剿的方略上与云南的地方官意见不一致,云南地方官便将剿灭义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到窦垵、黄琮等人的身上。咸丰七年(1857年)年底,云南巡抚桑春荣劝说窦垵离滇回京城供职。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初九,窦垵便携带家眷从昆明启程。途经成都时,窦垵得知他已被云贵总督吴振械弹劾而革职。进退两难的窦垵只好滞留在成都、重庆等地,在重庆的东川书院讲学并担任山长。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窦垵得到同治皇帝的宽赦。经大学士倭仁、四川总督罗秉彰、河漕总督严树森等人的先后保举:“垵居官正直、贤声夙著,不宜以小故遽废终身。”于是同治便决定召见窦垵。窦垵在进京的途中,于十一月晦日经过岳阳,第六次登临岳阳楼并写有七言律诗一首:

“卅载光阴六泛舟,白雪堆破夕阳楼。杜公戎马关山泪,范相江湖廊庙忧。雨榭晴帆今古在,高文名笔鬼神留。且随衡雁南飞去,几许归来记七游。”

同治皇帝召见窦垵后,委以知府职务,发往贵州差遣委用,主办办防局。同治三年(1864年)或同治四年(1865年),窦垵从京城前往贵州赴任。大约于四五月间经过岳阳,第七次登临岳阳楼。窦垵这次登临岳阳楼心情最好,因为他亲眼看见自己撰写的岳阳楼长联已经由何绍基书写后悬挂在范记雕屏的两边。他使用六登岳阳楼诗的原韵再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出处常怀范相忧,卅年七泛少陵舟。地收吴楚难为水,天设湖山供此楼。万顷外疑波不尽,千秋中有我来游。故人珍重书楹帖,好与张公墨妙留。”

窦垵第七次登临岳阳楼后,于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辗转抵达贵阳。由于旅途劳苦,竟于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六十一岁。纵观窦垵的一生,不但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深厚的忧国忧民情怀,其七登岳阳楼的诗作中也充分展现着这种情怀,体现了窦垵为官忧国忧民、奉公守法、刚正不阿的高尚品质。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